

税收对服务企业社会保险负担的影响

李杨鑫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3年7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3年7月25日; 发布日期: 2023年9月14日

摘要

随着劳动力市场紧缺与用工成本持续上涨, 企业生产经营正面临巨大的挑战, 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激发企业活力, 中国势必长期坚持减税降费。在此背景下, 本文使用服务业上市公司2015~2019年的财务数据, 考察企业税负对其社会保险负担的影响, 为理解政府减税行为对社保缴纳乃至企业经营提供了实证参考。实证研究发现, 减轻企业税负有助于缓解社会保险负担, 这一结论在排除内生性风险后依然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 二者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企业的风险抵抗能力发挥直接作用, 用工成本充当了一个中介路径。并且, 税收负担对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影响力度更大。本文对于制定针对性减税政策, 缓解企业社会保险负担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企业, 税负, 社会保险, 减税, 服务业

The Impact of Taxation on the Social Insurance Burden of Service Enterprises

Yangxin Li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ul. 13th, 2023; accepted: Jul. 25th, 2023; published: Sep. 14th, 2023

Abstract

With the shortage of labor market and the continuous rise of labor costs, enterprises'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re facing huge challenges.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downward pressure of the economy and stimulate enterprise vitality, China is bound to persist in long-term tax and fee reduction. In this context, this article uses financial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from 2015 to 2019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corporate tax burden on their social insurance burden, pro-

viding an empirical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tax reduction on social security payment and even corporate operations. Empirical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reducing the corporate tax burden can help alleviate the burden of social insurance, 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significant even after excluding endogenous risks. Further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two mainly plays a direct role through the risk resistance ability of the enterprise, and labor costs serve as an intermediary path. Moreover, the tax burden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medical insurance, maternity insurance, pension insurance, and housing provident fund. This article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formulating targeted tax reduction policies and alleviating the burden of corporate social insurance.

Keywords

Enterprise, Tax Burden, Social Security, Tax Cuts, Service Industry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劳动力市场紧缺与用工成本持续上涨,人口红利窗口逐渐关闭,中国不断接近“刘易斯拐点”,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以及老龄化问题的出现,中国宏观经济和企业经营正面临巨大的挑战。就企业经营而言,社会保险是企业用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承担的“五险一金”总费额往往超过企业职工工资的40%,不仅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和经营效益,还可能会降低职工工资、增加社会失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赵健宇等, 2018 [1]; 钱雪亚等, 2018 [2]; 唐珏和封进, 2020 [3]; 宋弘和封进, 2021 [4])。部分企业面临过高的社保缴费负担,会在成本和收益间进行权衡,可能选择低报缴费基数、瞒报雇工人数等违法途径逃避缴费(封进, 2013 [5]; 赵绍阳, 2020 [6]; 赵绍阳, 2021 [7]),威胁社保体系的健康运行。

减税降费是发挥市场的效率优势、降低企业经济成本的重要举措和抓手。根据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19~2021 三年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分别高达 2.36、2.5、1.1 万亿元,减税降费对于降低经济成本,增加社会收入,提高消费和投资水平,有效刺激社会需求有关键作用(杨灿明, 2017 [8]; 刘启仁、黄建忠, 2018 [9]; 刘启仁等, 2019 [10]; 王智烜等, 2020 [11])。税收和社保是减税降费的两大方面,在以往的政策中二者往往叠加实行,双管齐下,导致在相关研究中二者的界限比较模糊。但是税收和社保的经济属性和征管制度都不相同,对经济的影响机制也有所差异。本文决定打破税收与经济发展、社会保险与经济发展的传统思路,将税收与社保联系对立起来,探讨企业税负对社会保险负担的影响。同时考虑与传统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因其行业特性吸附了更大数量的劳动力,因此面临着更大程度的社保缴费负担和用工成本。本文鉴于服务业对于促进社会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和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将服务业企业纳为研究对象。

本文潜在的贡献在于,第一,将“税收”和“社保”联系对立起来,对于梳理税费关系,推动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贯彻落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指导作用;第二,运用详实的财务数据和科学的实证方法,精确地量化了企业税负对社会保险负担的影响,为考察减税政策对企业经营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了经验参考;第三,将服务业作为研究对象,对于促进社会就业与和谐稳定,挽回经济颓势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本文余下的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为模型、变量和数据介绍，第三、四部分为实证检验和进一步分析，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2. 模型、变量和数据介绍

2.1. 模型设计

本文关注企业税负对社会保险负担的影响，参考已有研究，本文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具体的模型设置如下：

$$\text{Lnsir}_{i,t} = \beta_0 + \beta_1 \text{Lntax}_{i,t} + \beta_2 X_{i,t} + \varphi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text{Lnsir}_{i,t}$ 表示 i 企业在 t 年度的社会保险负担率的自然对数；解释变量 $\text{Lntax}_{i,t}$ 是 i 企业在 t 年度的税收负担率的自然对数； $X_{i,t}$ 表示一系列可能直接影响被解释变量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企业规模、薪资水平、资产负债率水平、盈利能力、有形资产担保价值、市盈率等变量； β_0 代表截距项； φ_i 代表个体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企业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的影响； μ_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用来控制特定年份的宏观经济因素和政策变动等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企业的影响； $\varepsilon_{i,t}$ 代表随机扰动项。

2.2. 变量说明

本文关注企业税负的变化对社会保险负担的影响，采用税收负担率的自然对数作为解释变量，来衡量企业的整体税负水平。被接受变量采用社会保险缴费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社会保险负担的代理变量。此外，本文选取了一系列可能直接影响企业社会保险负担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薪资水平、资产负债率水平、资产回报率水平、有形资产担保价值、市盈率、托宾 Q 值、收益留存率、股权集中度、所有权性质、政策冲击等等。表 1 为各变量的详细说明。

2.3.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CSMAR 数据库 2015 至 2019 年我国服务业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在此基础上剔除 ST、*ST 上市公司和实际税率异常以及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并对所有连续型变量的分布两端进行 1% 水平的缩尾处理。

2.4. 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社会保险负担的均值为-3.991，中位数为-3.941，表明有一半以上的企业低于行业社会保险负担的平均水平；标准差为 0.865，表明样本企业的社会保险负担率差距不大。从样本企业的税收负担来看，平均值为-3.756，中位数为-3.717，表明同样一半以上的样本企业的税收负担低于平均值；最大值为-0.682，说明部分企业的税收负担较重，有下降空间。资产负债率的中位数为 0.402，略低于均值 0.425，且标准差较小，说明上市公司的负债水平普遍不高且差异不大。资产回报率的平均值为 0.034，中位数为 0.039，标准差仅为 0.074，说明上市公司的资产回报率较为稳定。有形资产担保价值的中位数为 0.182，低于均值 0.231，说明半数以上上市公司的存货和固定资产占资产比例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企业市盈率的最小值为 0.464，最大值为 105.172，标准差高达 14.437，说明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存在较大的差异。托宾 Q 值的均值为 2.258，中位数为 1.713，说明半数以上的企业市值被高估了。股权集中度均值为 0.325，中位数为 0.301，且标准差较小，说明服务业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水平并不是很高。所有权性质均值为 0.225，中位数为 0，说明样本企业中非国有企业占主要部分。

Table 1.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表 1. 主要变量统计特征

变量	变量定义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sir	社会保险缴费/营业收入(取自然对数)	-3.991	-3.941	0.865	-6.607	-1.855
Lntax	应交税费/营业收入(取自然对数)	-3.756	-3.717	1.064	-6.534	-0.682
Size	年末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22.540	22.210	1.739	19.740	28.810
Lab	应付职工薪酬(取自然对数)	17.680	17.469	1.881	13.230	22.980
Dar	年末负债/年末资产	0.425	0.402	0.221	0.056	0.936
Roa	净利润/年末资产	0.034	0.039	0.074	-0.382	0.191
Tav	(存货 + 固定资产)/资产总额	0.231	0.182	0.185	0.003	0.778
Pe	市盈率/10	8.160	4.135	14.437	0.464	105.172
Tobin'Q	股价/企业重置成本	2.258	1.713	1.779	0.847	12.540
Rre	(税后利润 - 应发股利)/税后利润	0.746	0.789	0.245	-0.519	1
Ec	前三大股东权益份额/公司总权益	0.325	0.301	0.155	0.076	0.757
Os	是否为国有控股	0.225	0	0.418	0	1
Att	是否为2019年以后	0.231	0	0.422	0	1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

在具体的实证回归开始前, 本文首先进行了豪斯曼检验, 验证固定效应模型的合理性。检验结果 P 值小于 0.01, 可以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进一步采取过度识别检验, 检验结果仍然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因此,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进行回归估计是合理的。

随后对模型(1)进行基准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2 前三列所示。在第(1)列中, 我们只控制了核心解释变量; 第(2)列中, 剔除核心解释变量, 只对控制变量进行了回归; 第(3)列中, 同时纳入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回归估计。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tax burden on social insurance burden

表 2. 企业税负对社会保险负担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Lnsir	Lnsir	Lnsir	Lnsir
L.Insir				0.821 ^{***} (0.066)
Lntax	0.158 ^{***} (0.041)		0.187 ^{***} (0.040)	0.100 ^{**} (0.047)
Size		-0.011 (0.079)	-0.067 (0.064)	-0.130 ^{**} (0.059)
Lab		0.073 ^{**} (0.034)	0.075 ^{**} (0.032)	0.151 ^{***} (0.052)

Continued

		-0.436**	-0.425**	-0.416
		(0.173)	(0.165)	(0.292)
		-0.851***	-0.984***	-1.462**
		(0.181)	(0.181)	(0.611)
		-0.298*	-0.162	0.179
		(0.173)	(0.149)	(0.306)
		0.004***	0.004***	-0.004
		(0.001)	(0.001)	(0.005)
		0.022	0.023*	-0.001
		(0.014)	(0.014)	(0.055)
		-0.072	-0.093*	0.188
		(0.051)	(0.050)	(0.231)
		0.197	0.008	0.309
		(0.428)	(0.372)	(0.409)
		-0.041	-0.040	0.058
		(0.032)	(0.031)	(0.080)
		0.036	0.088**	-0.022
		(0.049)	(0.044)	(0.030)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
<i>N</i>	3151	3159	3150	2409
<i>R</i> ²	0.062	0.059	0.129	\

注：基准回归中采用聚类标准差，在企业层面聚类。***、**、*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下同。

从结果可以看出，在第(1)列和第(3)列中，税收负担率的对数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并且都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企业税负担与社会保险负担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的社会保险负担会随着税负上涨而上涨。换言之，减税可以有效地缓解企业的社会保险负担。第(3)列可以得知，税收负担率的对数的系数为 0.187，表明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有效税负上涨 1%会引起社会保险负担上涨 0.187 个百分点，说明减税对社会保险负担的缓解作用相当可观。

另外，控制变量的系数方向都符合预期，企业规模、薪资水平、资产负债率水平、资产回报率水平、市盈率和托宾 Q 值的系数都较为显著，并且企业规模和资产回报率的回归系数都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除薪资水平和市盈率系数为正以外，其他四个变量的系数都为负。薪资水平的系数为正，说明薪资水平越高的企业，社会保险负担越重，因为社保缴纳额是以员工薪资作为基数计算的，所以回归结果符合理论预期和现实状况。市盈率系数为正，说明企业的社会保险负担随股价水平同向变动。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水平、资产回报率水平和托宾 Q 值的系数为负，说明资产雄厚，资金充足，经营效益好的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经营实力消化并降低社会保险负担。

3.2. 内生性分析

但是前文的回归估计可能受到潜在的内生性威胁，第一，是否还存在某些未控制的因素同时影响企业税负和社会保险负担？第二，解释变量的测量误差是否依然存在？第三，社会保险受到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那么社会保险缴纳比例越高的企业是否更有可能获取税收优惠，引起企业税负的变化呢？

对于遗漏变量问题，我们在基准回归中已经做了比较细致的处理，一方面控制了企业规模、薪资水平、资产负债率水平、资产回报率水平、有形资产担保价值等可能直接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因素；另一方面加入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企业不可观察因素和年份不可观察因素的影响。但是，遗漏变量问题仍然可能存在，比如企业对未来的异质性预期和政策的差异化影响等因素无法进行有效的控制。对于测量误差问题，虽然 CSMAR 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企业年报，但是税费和营业收入等变量仍然可能存在测量偏差，同时企业会倾向于选择延迟税收缴纳时间，以换取更充分的现金流，导致当期税收负担率不能准确反映企业的真实税负。对于双向因果关系问题，社会保险负担与税收负担具有同向变动趋势，并且政府为了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提升社保缴费效率，可能对社会保险缴纳负担更重的企业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因此，内生性问题可能会导致基准回归的系数出现偏差。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采用带有工具变量的 GMM 广义矩估计法进行回归分析，既有利于解决核心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又可以为基准回归提供稳健性检验。新的模型设置如下：

$$\text{Lnsir}_{i,t} = \beta_0 + \beta_1 \text{Lnsir}_{i,t-1} + \beta_2 \text{Lntax}_{i,t} + \beta_3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本文借鉴董黎明等人的研究，将 *Lntax* 的一阶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12]。工具变量既满足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同时当期社保缴费不会对过去的税负产生影响，又满足外生性。GMM 估计结果如表 2 第四列所示，解释变量依然在 5%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由基准回归的 0.187 下降为 0.100，说明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高估了税收负担的作用。就控制变量而言，各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GMM 估计结果证明，前文的实证结论是可靠的。

3.3. 稳健性分析

本节对上文结论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鉴于住房公积金的征缴途径与社会保险相似，本文引入社会保障负担率作为替代指标进行对照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使用基准面板回归，两个指标的系数都非常显著。

Table 3.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类型	Lnsir		Lnssr	
	(1)	(2)	(3)	(4)
	Fe	GMM	Fe	GMM
基准面板	0.187*** (0.040)	0.100** (0.047)	0.188*** (0.040)	0.090** (0.046)
平衡面板	0.204*** (0.044)	0.107** (0.048)	0.205*** (0.044)	0.095* (0.047)
剔除 2019 年数据	0.187*** (0.046)	0.153*** (0.097)	0.187*** (0.046)	0.142*** (0.096)

注：回归控制了上述所有控制变量，限于篇幅，仅报告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下同。

同时，考虑到估计结果可能受到企业的进入与退出的影响，比如企业上市初期可能迅速扩张，导致财务数据有异常，税收负担与社保缴纳负担的相互影响可能存在偶然性。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使用平衡面板数据来解决，仅保留连续存在五年的企业子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3 第二行所示，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的进入与退出对本文的实证结果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另外，2019 年正式推行“社保入税”可能引起企业在社保缴纳和雇佣选择等问题上的决策差异，导致模型分析出现偏差。因此第三行我们剔除了 2019 年数据，回归结果与前文几乎一致，回归系数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社保入税”政策对本文的实证分析并不带来明显的威胁。综上，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相当稳健的。

4. 进一步分析

4.1. 机制分析

本部分考察企业税负对社会保险负担影响的内在机制。企业的社会保险负担与职工薪酬和经营效益即用工成本有关，这既反映在社保费是用工成本的重要组成，也体现于职工薪酬是社保费的计算基础。因此，本文使用温忠麟等人提出的分步回归法[13]，引入企业的薪资收入比衡量用工成本并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回归方程：

$$\text{Lnsir}_{i,t} = \beta_0 + c * \text{Lntax}_{i,t} + \beta_2 X_{i,t} + \varphi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text{P_in}_{i,t} = \beta_0 + a * \text{Lntax}_{i,t} + \beta_2 X_{i,t} + \varphi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text{Lnsir}_{i,t} = \beta_0 + c' * \text{Lntax}_{i,t} + b * \text{P_in}_{i,t} + \beta_2 X_{i,t} + \varphi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5)$$

表 4 为中介效应分析的回归结果。加入中介变量后，税收负担与社会保险负担的显著关系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系数相较于之前的 0.187 显著减小为 0.122，并且薪资收入比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这说明用工成本在税收负担和社会保险负担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这是因为企业的税负水平上升，会在短期内直接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的经营效益，即营业收入短期内下降，而企业的薪酬支出刚性，结果是薪资收入比将在短期内上涨。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额是以职工薪酬作为计算基础，乘以固定的缴费率。在无重大政策变更的前提下，社保缴费率不变，随着薪酬收入比的上涨，社会保险负担率相应上升，最终导致企业社会保险负担加重。

Table 4. Mesomeric effect

表 4. 中介效应

变量	(1) Lnsir	(2) P_in	(3) Lnsir
Lntax	0.187*** (0.040)	0.055*** (0.019)	0.122*** (0.023)
P_in			1.156*** (0.192)

解释变量的系数仍然为正，说明税收负担对社会保险负担有显著的直接效应。那么税收负担通过什么机制发挥作用？本文认为是：企业的风险抵抗能力。企业的风险抵抗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企业的收入水平和负债水平。通常，企业的收入越高、负债越低，其抵御未来不确定风险的能力越强，税收负担上涨虽然会带来短期经营效益的下降，但是由于其在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的信心，因而税负上涨对

其影响会随着风险抵抗能力的提高而逐渐降低。因此本文用营业收入和总负债来衡量企业的风险抵抗能力，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相比于收入水平低、负债水平高的企业，收入水平高、负债水平低的企业风险抵抗能力更强，其系数明显更小。

Table 5. Direct effects
表 5. 直接效应

变量	企业收入		企业负债	
	(1) 低	(2) 高	(3) 低	(4) 高
Lntax	0.173 ^{***} (0.040)	0.055 ^{**} (0.024)	0.056 [*] (0.031)	0.272 ^{***} (0.062)

4.2. 社保内部分析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类型不同，缴费比例不一，企业面临的社会保险负担也会略有差异。比如养老、医疗以及失业三类保险是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的，但生育和工伤保险是由企业单独承担的。基于这些差异，本文力图检验税收负担是否对所有类型的社会保险缴纳负担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影响存在多大的差异？同时考虑到住房公积金的征缴路径与社会保险类似，本文也将住房公积金纳入被接受变量。根据表 6 的分组回归结果可知，所有系数均为正，且都较为显著，说明税收负担会加剧每一类型的社会保险负担。并且，税收负担对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影响力度更大，有效税负上涨 1% 对后者的影响均超过 0.2 个百分点。

Table 6. Internal analysis of social security
表 6. 社保内部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医疗	工伤	生育	养老	失业	公积金
Lntax	0.219 ^{***} (0.051)	0.191 ^{***} (0.050)	0.206 ^{***} (0.052)	0.207 ^{***} (0.053)	0.184 ^{**} (0.054)	0.207 ^{***} (0.054)

5.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服务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研究发现，企业税负对社会保险负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论对于不同的模型、不同指标、不同设定都十分稳健，充分说明减税可以有效缓解企业用工成本，降低社会保险负担。机制分析证明，企业税负对社会保险负担的影响主要通过企业的风险抵抗能力发挥直接作用，用工成本充当了两者中的一个中介。并且，税收负担对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影响力度更大。

基于该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降低总体税负水平，促进企业实质性减税。虽然我国几轮减税降费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企业的总体税负水平仍然较高，相关的税收负担依然存在较大的下降空间。税务部门应该在统筹考量企业的总体税负水平的前提下，充分考察不同税收优惠方式和不同税种组合形式对企业用工成本和营业收入的影响，有针对性地补充并完善现行的减税政策。同时应积极简化税收征管形式，鼓励企业通过

合法途径进行税收筹划，促进企业实质性减税降负。

第二，优化现有税制结构，强化直接税作用。在我国现行税收征管制度下，企业承担着最为主要的纳税任务。直接取自企业的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占有较大比重。虽然理论上企业可以在商品和服务的定价过程中，通过调整价格水平将相关税负转嫁至消费者。但是实际转嫁过程往往非常复杂，且过高的间接税对企业经营所需的现金流具有致命的阻滞作用，导致间接税负担依然是遏制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强化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地位，适当弱化企业直接负担的间接税的比重，是优化现有税制结构的核心任务所在。强化直接税的关键在于，降低税收收入对企业部门的依赖程度，让社会居民更多地融入到税收征管的环节中来，税收收入直接取自居民，进而实现提高直接税的比重、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减轻企业纳税负担的目的。最终，在不增加整体税收负担的前提下，保障税收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间的公平分配。

第三，基于服务业企业特征，出台具有针对性的减税政策。首先，进一步强化税收优惠政策对社会保险的支持作用，扩大企业社保支出加计扣除的比例和范围。其次，针对吸附社会就业数额较大且实际缴纳社会保险额度较高的企业，适度采取优惠退税政策。另外，建立大数据信息化技术平台，通过计算机分析服务业企业纳税特点，制定差异化、局部性的税收优惠。最后，建立税收优惠监察评估机制，监督企业合法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打击虚假列支和瞒报收入等以违法途径获取税收优惠的行为，让相关政策“落到实处”。

当然，本文的分析还存在部分局限性。首先，本文关注税收负担对企业社会保险缴纳负担的影响，而近年来中国税制经历了种种的改革，如“营改增”、新个税改革。这些税制变动如何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宏观经济运行，以及不同税种对社保的差异性影响，仍有待深入讨论。其次，在应对经济波动时，尤其是近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暂时性的减税政策更灵活。暂时性减税政策能否同样影响企业的社保缴纳负担，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最后，本文数据来自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上市公司本身财务制度更为健全、社保缴费更为规范。相同研究成果能否在其他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中应验，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赵健宇, 陆正飞. 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会影响企业生产效率吗? [J]. 经济研究, 2018, 53(10): 97-112.
- [2] 钱雪亚, 蒋卓余, 胡琼. 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雇佣工资和规模的影响研究[J]. 统计研究, 2018, 35(12): 68-79.
- [3] 唐珏, 封进. 社保缴费负担、企业退出进入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社保征收体制改革的证据[J]. 经济动态, 2020(6): 47-60.
- [4] 宋弘, 封进, 杨婉彧. 社保缴费率下降对企业社保缴费与劳动力雇佣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21, 56(1): 90-104.
- [5] 封进. 中国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参与激励[J]. 经济研究, 2013, 48(7): 104-117.
- [6] 赵绍阳, 周博, 余楷文. 社保政策缴费率与企业实际参保状况——以养老保险为例[J]. 经济科学, 2020(4): 111-124.
- [7] 赵绍阳, 余楷文, 周博. 养老保险费率下降、缴费遵从度与企业异质性反应——基于全国税收调查的微观证据[J]. 财经科学, 2021(9): 66-79.
- [8] 杨灿明. 减税降费: 成效、问题与路径选择[J]. 财贸经济, 2017, 38(9): 5-17.
- [9] 刘啟仁, 黄建忠. 企业税负如何影响资源配置效率[J]. 世界经济, 2018, 41(1): 78-100.
- [10] 刘啟仁, 赵灿, 黄建忠. 税收优惠、供给侧改革与企业投资[J]. 管理世界, 2019, 35(1): 78-96+114.
- [11] 王智烜, 邓力平, 吴心妮. 减税降费的就业促进效应——基于异质性企业框架视角[J]. 税务研究, 2020(10): 16-20.
- [12] 董黎明, 邵军, 王悦. 税收优惠对信息通信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流转税和所得税视角的比较[J]. 税务研究, 2020(9): 126-131.
- [13]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刘红云.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5): 614-620.